

## 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

任育德

### 摘要

本文聚焦在胡適與蔣介石這兩位歷史人物於1948至1962年間的互動。作為近代中國重要學術領導人物的胡適，在1949至1958年間寓居美國，但仍關心臺灣時事與發展狀況，這可說是他生涯轉捩點。他和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亟欲透過軍事反攻大陸以雪恥的蔣介石，彼此因為反共而有共同合作的理由。但透過近年新出現的相關人物日記作觀察，則可知彼此性格及思想差異，從未因為彼此互動而消失。因此本文即分下列階段：依違離合、雪中送炭、緊張關係推升、衝突至破裂，以論述胡適與蔣介石之互動關係。蔣介石與胡適在外在環境緊迫時，確曾給予彼此支持，但最終也因為政治理念不同，胡適堅持憲政及自由人權主張，於出版法修正案、針對總統三連任問題、雷震案等事件導致胡、蔣之對立。

關鍵字：胡適、蔣介石、出版法修正案、總統三連任問題、雷震案

# Interactions between Hu Shih and Chiang Kai-shek from 1948 to 1962

Yu-Te Jen\*

## Abstract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unprecedented historical figures—Hu Shih and Chiang Kai-shek from 1948 to 1962.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leading scholars, if not the most, Hu stay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49 to 1958, with a very serious eye o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s this was the most crucial turning point in his later years or life. Chiang Kai-shek, who was very eager to use force, if necessary, to recover Mainland China to revenge his disgrace at the hands of the CCP, had ample reasons to cooperate with Hu for mutual and joint anti-communism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As soon as we are now being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respectively the diaries of these two pre-eminent figures in China, we can immediate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s regards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al thoughts, which resulted in their eventual parting of ways of sort. This essay lists roughly four-stage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ir interactions: first, there was separation 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in various areas; secondly, there was timely help rendered by Hu; thirdly, there were conflicts in acceleration; and finally, there was almost a complete break in their interactions. In the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when both Hu and Chiang were faced with serious external stresses, they would support each other. But as history shows,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 matters of political thoughts, publications law amendments, and Chiang's third term of presidency problem and the Lei Chen case did finally make their further and future interactions unprofitable or even impossible.

**Keywords: Hu Shih, Chiang Kai-shek, Publications law amendments, the third-term presidency, the Lei Chen Case**

---

\*Ph D.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Holistic Center,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胡適晚年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sup>\*</sup>

任育德<sup>\*\*</sup>

## 壹、前言

本文所謂胡適晚年係以 1948 年為起始。胡適於該年底離開北京，往後流寓海外九年，具有轉捩點意義，以此作為晚年起始當不為過。余英時以 1949 年 4 月寓居美國為起始。<sup>1</sup> 討論胡適、蔣介石一生關係論著數量頗豐，以中國大陸時期為主，或有關注胡蔣關係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擺盪、反共主張持論者；也漸有為胡適堅持自由主義而立論者，反映胡適研究從批判到重予評價之轉變。<sup>2</sup> 幾本與胡適有關傳記則述及，蔣介石、胡適觀念差異，導

---

<sup>\*</sup>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之草成，感謝陳宏正先生提供諸多協助，深致謝忱。撰寫蔣介石、胡適等民國人物相關研究先進及匿名審查人亦予多方啟迪。唯論述不周處仍由筆者承擔。

收稿日期：2011 年 5 月 2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 年 9 月 29 日。

<sup>\*\*</sup>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輔仁大學全人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sup>1</sup> 胡頌平的《胡適之晚年談話錄》，是以跟隨胡適身邊服務為始。楊金榮則從人物時間段落處理，以 1948 年為分野。楊金榮，〈重新認識一個完整的胡適——胡適晚年研究管見〉，《南京社會科學》，1998 年第 2 期（1998 年 2 月），頁 50-55；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14。

<sup>2</sup> 前驅論文為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胡適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 年）。後繼者如沈衛威，〈胡適與蔣介石三任總統〉，《河南大學學報》，1995 年第 3 期（1995 年 5 月），頁 60-65；沈寂，〈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編，《胡適研究》，第 1 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年）；劉紹唐，〈胡適與蔣介石——從最近臺北出版的「胡適日記手稿」看蔣胡關係〉；牛大勇，〈不打不成交——抗戰前十年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均收入李又寧主編，《胡適與國民黨》（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 年），頁 1-90；高志勇，〈論胡適與蔣介石政治關係的轉變——以《獨立評論》刊行時段為界〉，《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36-43；智效民，〈胡適與蔣介石——從胡氏日記看二人的交往〉，《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年）。

致胡對蔣在尊重與支持，蔣對胡維持禮遇態度之外，雙方關係仍現緊張。<sup>3</sup> 至於探討 1950 年代以後蔣介石與胡適互動之近作，以楊金榮、余英時、陳儀深值得注意。楊著根據當時所見公開材料並參酌部分海外資料，用角色理論解釋其「衝突與緊張」，認為他晚年是「書生命運的悲劇」，對胡「書生」堅持有所見。余英時就《胡適日記》與書信指出，胡適晚年關懷確以臺灣為重心，環繞在使臺灣成為名符其實的「自由中國」，求將之推廣於中國之可能，強調其「餘暉」。<sup>4</sup> 陳儀深從臺灣政治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從人在美國，心在臺灣（1950-1958）及擔任中研院長（1958-1962）兩階段進行討論。<sup>5</sup> 但前述研究於處理另一方人物蔣介石的內心觀感，畢竟是從間接資料或另方說法出發，如能加入蔣介石觀感，於二人關係與主體性研究自可獲致更形豐富之面貌。

陳紅民近作即透過蔣介石及胡適日記排比對照，呈現雙方是「一個事件，各自表述」，藉以突顯蔣介石在日記中痛罵胡適與在公開場合對胡之「禮遇」的鮮明對比，甚令他感到「震驚」。<sup>6</sup> 史學研究中運用相同史料，在不同研究觀點下得出不同結果並非特例。在胡適研究中亦然。本文透過近年逐步公開或出版所涉主要人物日記（如蔣介石、梅貽琦、雷震）、書信（如雷震與胡適）及相關資料集等史料，再度梳理蔣介石與胡適彼此關係及互動，聚焦於 1948 至 62 年間胡適與蔣介石之互動，藉以瞭解身為國家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遭遇學界重要人物、日後也成為最高學術行政領導人的胡適時，雙方互動所透露的微妙心理與想法，和實際行動之間並非完全一致，這也是人物的真實面貌要素之一，不可輕易忽略。我們也可藉此瞭解更多胡適面臨與領導人言語立場不合時，自我定位與處境之思考，一併瞭解其個性與侷限之源由。

---

<sup>3</sup> 如沈衛威，《胡適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年）；胡明，《胡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年）；劉健清等，《蔣介石和胡適》（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年）；陳漱渝、宋娜，《胡適與蔣介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sup>4</sup>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 132。

<sup>5</sup> 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 47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187-216。

<sup>6</sup> 陳紅民、段智峰，〈相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

## 貳、依違離合（1932.12-1948.12）

蔣介石與胡適二人之間的正式互動，應該是從 1932 年底開始，蔣介石在 1932 年 4 月起在錢昌照協助之下，開始有系統的與學人接觸與互動。<sup>7</sup> 胡適（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長）與蔣介石首度見面（1932 年 11 月 18 日）時，贈送《淮南王書》。胡適送書，意在要蔣「無為而治」，不要事事干預。1934 年間，胡適即致函蔣介石，仍勸蔣少管事。從 1935 年 7 月 26 日，胡適致信羅隆基透露此事，認為蔣管得太多，「微嫌近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漢口初見蔣介石，送書便「意在請他稍稍留意《淮南》書中的無為主義的精義」。<sup>8</sup> 換言之，胡適以知識分子透過送《淮南王書》及當面對統治者提出建言，表達以個人身分「勸諫」方式建言，並表達政治理念：「無為」，該書將無為歸納為三種意義：虛君的法治、充分運用眾智眾力、變法不拘守故常。<sup>9</sup>

蔣介石對胡適，表示親善之意。如第一次談話時，即贈送自己著作予胡適，以示同為文人。蔣對胡之攬絡，與胡適在中國已有學術領導地位有關，既可外示尊重學界，亦寓延攬之意。在中日戰前延攬學人入閣就是開端，戰爭爆發後組織國防會議、國民參政會，均有示外間廣開言路、收攬民心的作用在內。在軍事層次，蔣力行以黃埔系學生替代地方軍系部隊人事，力圖實現軍政軍令的統一化。<sup>10</sup> 抗戰爆發，政府需才孔急狀況，胡適先赴美活動，

---

《近代史研究》，2011 年第 2 期（2011 年 3 月），頁 18-33。震驚出自該文頁 19。

<sup>7</sup> 錢昌照是黃郛（蔣介石盟兄）的連襟之一，曾任教育部副部長。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頁 35。近人研究，參見金以林，〈蔣介石的 1932 年〉，收入於王奇生等，《蔣介石的親情、友情與愛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243-250。

<sup>8</sup> 〈胡適致羅隆基函〉，1935 年 7 月 26 日，收入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胡適年譜長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校定版），冊 4，頁 1399-1400。

<sup>9</sup> 胡適，《淮南王書》（上海：新月書店，1931 年），頁 69；胡明，〈讀《淮南王書》〉，《讀書》，1993 年第 3 期（1993 年 3 月），頁 11-17。

<sup>10</sup> 這方面較新的中文研究，可參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於 1938 年夏天擔任「一生唯一的政府公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從事對外宣傳，以爭取美國援華。<sup>11</sup> 以胡適聲望之隆，已可直接和美國總統與政要談話，在前後任駐美大使中難得一見。<sup>12</sup> 唯胡適在駐美大使任期中密集從事宣傳活動，無法帶給蔣介石冀望美國直接參戰、大規模軍事財政資源援助，蔣另行建立以宋子文為雙邊決策者直接溝通管道；加以胡適對中美外交關係自我角色及定位，與蔣基調有異，終致胡適於 1942 年 8 月自駐美大使卸職。<sup>13</sup> 胡適卸職後，拒絕蔣聘為顧問酬庸，以學人身分寓居紐約。

戰後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其意見成為外間觀察學界意向的風向球，1947 年起成為蔣欲延攬入政界之學界指標，如蔣欲出任考試院長，遭胡以維持超然地位為由拒絕。<sup>14</sup> 由此段時間胡適記載顯示，他刻意拒絕進入政府任職，並非是與統治者站在對立與異議位置，較偏近不希望被視為統治者的扈從；因此選擇站在「諍友」位置，以「獨立人士」姿態維持對政治事件發言權。這種「諍友」支持政府的立場，也受到當政者肯定。<sup>15</sup>

胡適入閣與否的傳言在學界傳開，擔心胡是否被政府「招安」而喪失獨立立場者大有人在。如 1947 年 5 月學潮期間，胡適支持給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抗議「不合法逮捕」。<sup>16</sup> 陶孟和即讚許其直言無忌，「大家所憂慮者，

<sup>11</sup> 胡適知道他是在蔣授意下取代原駐美大使王正廷。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 冊，頁 138，1938 年 7 月 20 日。

<sup>12</sup> 周谷，《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33。

<sup>13</sup> 於此議題，張忠棟率先運用胡適日記和美國外交檔案。張忠棟，〈出使美國的再評價〉，收入於《胡適五論》（臺北：允晨出版社，1987 年），頁 113-155。王世杰即提及，胡曾勸解中方應多所諒解美方政府運作，以中國政府「無人為諍言為可慮」，辭去大使意志堅決。胡與蔣對美國定位與立場歧異，顯非一時。1942 年 7 月 1 日，〈王世杰日記〉，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吳景平從多方面史料比對後，也得出中國對美國戰略利益、國家基本價值、體制及其運作等未盡瞭解、造成外交定位問題不免錯位。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美國對華財經援助〉，《史學月刊》，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70-79。

<sup>14</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7 冊，頁 649-50、651、653，1947 年 3 月 18-19 日、3 月 29 日、4 月 17 日、4 月 19 日。

<sup>15</sup> 蔣曾如此記載：「能不顧一切誹謗而毅然能擁護政府，其為國之精誠毫無條件，殊不易得之諍友也」。《蔣中正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47 年 3 月 18 日。

<sup>16</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7 冊，頁 654-655，1947 年 5 月 18 日。

可從此冰釋矣」。陶所言「憂慮」，自是胡適是否不再保持「獨立地位」跟提出「諫言」。胡適此一發言，竟使官報不敢全文發表，更顯示胡適立場令官方宣傳機構戒慎有加。蔣介石也對到訪北京和胡適會餐時，胡言語中的「高傲」有所抱怨，顯然當時仍堅信剿共必勝的蔣介石無法接受他人意見，表面稱會「犯而不校」，<sup>17</sup> 實則不然。

胡適如此態度，並未讓蔣放棄拉攏，以作為抗衡黨內派系勢力「引外打內」的籌碼，也可應付美國人的壓力。1948年當蔣介石考慮是否參選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時，黨內為副總統人選相爭不下，蔣擬以胡適出任「文人總統」，願任「輔佐」，既可「引外打內（國民黨）」，又減緩美方壓力。但事後仍親自出馬擔任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楊天石近作已參酌蔣介石日記及檔案，對此段時期考慮總統人選決策析論。<sup>18</sup>

同年9月下旬，胡適已向蔣直陳金元券政策之不當，10月下旬，中華民國政府在東北戰事吃緊，蔣介石邀約胡適吃飯，胡表示蔣應虛心認錯，要承認黃埔系軍人訓練不足，不可忽視北方軍事及信任負責人，經濟財政改革之錯誤應早日改正等。針對胡適10月言論，蔣「很客氣的接受了」。<sup>19</sup> 由日記推敲兩次談話，顯非和諧無事，故胡特意在日記留真處理及鋪陳，但另位當事人蔣態度從日記無可窺知。但胡適所記10月反應可能是對的。因為在11月下旬，宋美齡赴美求援，蔣擬組織戰時內閣，將胡適列入首席閣員與行政院長考慮人選之列，由陶希聖啣命相勸，胡適拒絕。<sup>20</sup> 但胡並非不關心人選，他特意記下鄭天挺（毅生）「人才內閣」論：黨人少要，舊閣員少要，必須有

<sup>17</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657，1947年5月22日；《蔣中正日記》，1947年11月28日。

<sup>18</sup> 「蔣經國函蔣中正如能謙辭總統退任行政院院長職務不獨可避免五院間之糾紛並足為行政立法間樹一良好基礎另呈人事管理辦法及幹部學校學生校長書等請核示」（1948年3月26日），〈蔣經國家書（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40700-004-008。

<sup>19</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19，1948年10月13日；頁722-723，1948年10月28日。

<sup>20</sup> 蔣記考慮人選包括胡適、孫科、陳立夫、俞鴻鈞、吳鐵城、李惟果、翁文灝。此舉自有爭取美國好感成分在內。《蔣中正日記》，1948年11月21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25，1948年11月22日。

聲望、見識及擔當，以傅斯年當副院長。<sup>21</sup> 鄭氏贊同胡適任閣揆弦外之音，不言可喻。12月4日，胡適和北大行政主管餐聚時，就表示，北大五十年校慶之後，要離開北大去政府所在地「做點有用的工作，不要再做校長了」，「至於我能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sup>22</sup> 此足顯示胡適對國家前途未卜，內心焦慮毫無掩飾。隨後幾天，有關胡適將接受中樞重任之說，出現報端，進京之說在北方報刊流傳。<sup>23</sup> 胡適重返政壇的試探信號大作。

### 叁、雪中送炭（1948.12-1956.10）

1948年12月15日下午離開北京至南京，1949年4月登上上海出發的克里夫蘭總統號「第六次出國」，4月21日抵達舊金山，27日到紐約，寓居紐約東81街104號（駐美大使卸任後租住處），直至1958年4月正式定居臺北，流寓海外近九年。

胡適赴美前後，關心政局發展，如停留臺北期間陳述北大西洋公約所代表的區域聯盟可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觀點。<sup>24</sup> 他與于斌、曾琦於5月13日聯名發電，質疑廣州傳出組織「緊急行動委員會」議論，希望政府儘管面臨緊急時刻，也應以遵守憲法作為對抗中共的重要資本為優先；電請代總統李宗仁赴廣州主持大局。<sup>25</sup> 他期望情勢處於下風的政府仍能堅守中華民國

<sup>21</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25，1948年11月26日。胡明指出，此體現胡適標榜行政人材選才標準。胡明，《胡適傳論》，頁992。

<sup>22</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26，1948年12月4日。胡明以為，此言反應胡適並未對蔣邀約決然斷念。胡明，《胡適傳論》，頁992。筆者以為，因為國家情勢不明，胡適必須決定去留，茫然難作決定可以理解，個人利益也非其入朝出仕之重點。

<sup>23</sup> 《益世報》，天津，1948年12月12日，版2；1948年12月15日，版2。

<sup>24</sup> 《人民日報》，1949年3月29日，版3。胡適受訪時談到：「大西洋公約固已明顯劃分兩個世界之壁壘，然正可因此使彼此有所戒備及畏懼，而可不再蹈歷史覆轍」。這一局勢也使蔣介石構思太平洋反共同盟，引發該年中訪問菲律賓及南韓之舉。呂芳上，〈總裁的「首腦外交」：1949年蔣中正出訪菲韓〉，《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年），頁351-370。

<sup>25</sup> 「于斌等呈蔣中正如我政府成立緊急行動委員會之建言及俞濟時擬覆因時局嚴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常委員會以集中黨力量」（1949年5月13日），〈各方建



憲法體制規範，勿作越分之想。

1949年6月，胡適對蔣廷黻表示，擬於9月返回中國組織一個自由黨以進行改革扭轉乾坤。<sup>26</sup> 這既顯示胡適尚未對中國局勢完全失望，亦顯示胡不排除再度由學術人成為政治人，只差在「朝」還是「野」。事實上，遊說胡適再入官場以救國，蔣廷黻已醞釀一段時間。但相對蔣廷黻記載，胡適在日記中僅輕描淡寫和蔣廷黻、宋子文聚餐幾次，僅6月14日記載稍多，揣測蔣、宋二人主動遊說，與蔣在歐洲受到 Thomas Corcoran 影響有關。<sup>27</sup> 宋子文更於6月23日致電蔣介石，建請讓胡適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爭取美援。在胡表示辭意後，蔣介石於27日回電希望胡先回國再作商議。<sup>28</sup> 蔣從未忽略胡適對美國的影響力與國際聲望，及其一舉一動對政府潛在之衝擊。

胡適可能感覺入「朝」並非佳策，加以心臟病再度發作，便在6月23日與7月2日兩度致電蔣介石，表明將維持「在野」角色，堅持不到任外交部長。這反應兩人聯繫並未中斷。胡表示：是個「無能的人」，因為責任感重「臨事而懼」因此發病；堅定反共，做官治事，「絕無能力」。<sup>29</sup> 蔣回函閻錫山，要拉住胡適，不可輕易讓他辭卸。<sup>30</sup> 胡推辭之餘，亦推薦有美國留學背景的葉公超及吳國楨為外交部長人選。<sup>31</sup> 此舉並不與推動組織新政黨相互矛

---

議（二）》，特交檔案—分類資料—政治，《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1-024-001。

<sup>2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480-481。

<sup>27</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74-775，1949年6月14日。按 Thomas Corcoran 是小羅斯福總統新政智囊團成員之一，後在華盛頓從事遊說活動，但杜魯門不喜此人，故 Corcoran 舉動並非美方授意。

<sup>28</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81，1949年6月29日。

<sup>29</sup> 「胡適呈蔣中正知閻錫山組閣將余列外交部長職自省無能力擔任而懇辭」（1949年6月23日、1949年7月2日），〈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二）〉，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29-006。

<sup>30</sup> 「蔣中正電閻錫山謂胡適似有入閣可能請堅留不許其辭」（1949年6月20日），〈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400-031-062。

<sup>31</sup> 「閻錫山電蔣中正胡適堅辭外長並薦葉公超吳國楨兩人選代」（1949年7月3日），〈京滬撤守前後之戡亂局勢（一）〉，革命文獻—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0-202040-031-069。

盾。胡適是願意，也不吝惜給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予道義與實際支持。

1949年底，參與討論國民黨改革事務、欲推動反共人士大聯合的雷震，於創刊伊始之《自由中國》刊登蔣廷黻「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亦引發香港報刊揣測，二者合為一談。<sup>32</sup> 從〈綱要〉刊登時機、組織綱要顯示該黨標榜民主、人權價值，不與國民黨競爭權力，反欲協助國民黨推動改革。<sup>33</sup> 此舉意味「中國自由黨」自我定位：國民黨的盟友與幫助者。若從雷震等人在1949年4月初至浙江奉化見蔣介石，由蔣贊成「自由中國社」之組織並願意贊助言，<sup>34</sup> 顯然蔣介石1949年初下野之後希望拉攏自由知識分子成為反共助力，也在思考「引外打內」。不過，蔣廷黻並不知道蔣介石真正意向，以及彼此對於組織政黨意涵及概念差異。《顧維鈞日記》提及，謝壽康和顧維鈞談話時說：「王世杰主張建立自由黨以接管政府，委員長予以默許，甚至同意予以資助。」這或許很容易讓人視為蔣予以認可。顧維鈞事後指出，執政者對於自由黨的角色定位並不一致：「王世杰和委員長所想的不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上的反對黨，而是一個開明的團體……但是從根本上講，他（委員長）並不贊同成立另一個政黨，尤其是由強有力而受歡迎的開明的領袖們所組成的政黨。更確切地說，他考慮的是當時需要建立一個陣線，一個由開明的領袖人物組成的新政府，以引起美國的重視。」<sup>35</sup> 此即彼時開明人士在臺灣政軍界之作用。但蔣介石曾在日記中突然寫到美國籌組第三勢力的號召「務使一般智識階級與投機分子反共擁蔣者而皆變為反共反蔣」，<sup>36</sup> 對「外力」已趨戒慎懷疑。

<sup>32</sup> 〈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自由中國》，第2卷第1-2期（1950年1月1及16日），頁34、65。據蔣廷黻一年之後告訴雷震，該綱領經過胡適修改幾次，最後僅對一兩點不同意。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76，1951年4月8日。

<sup>33</sup> December 23, 1949, Tsiang Ting-fu Diaries. microfiche, Harvard University. 值得玩味的是，張忠紱提及，蔣廷黻曾明言已秘密報告過蔣介石，希望以此獲得美援。張忠紱，《迷惘集》（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68年），頁231。

<sup>3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1冊，頁174，1949年4月4日。

<sup>35</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7冊，頁482-483。蔣廷黻並未得到蔣介石回函，參見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33冊，頁77，1951年4月8日。

<sup>36</sup> 《蔣中正日記》，1949年11月19日，上週反省錄。

依蔣廷黻之說，該年 11 月蔣介石已詳悉該黨組織相關情況，但後者從初步的准許，到日後的擱置，或與政情判斷有關，蔣廷黻或許因為時空隔絕與思路差異，顯然並不清楚、或者誤解蔣介石的想法。張茲闡帶話給蔣廷黻，表示 1950 年初臺灣情況已比先前穩定，<sup>37</sup> 就可能釋出無需組織的訊號。如由 1949 底雷震對胡適談及臺灣政情時指陳，中國自由黨組織章程需多所補強，負責人選亦需注意，既欲拱胡適出任自由中國運動領導，以展現號召各方自由人士團結之意，卻也認為蔣廷黻並非好的組織者，<sup>38</sup> 間接顯示部分人士對中國自由黨之微妙態度。

胡適、蔣廷黻沒有進一步行動，使中國自由黨組黨無疾而終。其實，1949 年下半年，蔣廷黻向在美國紐約的宋美齡解釋組黨計畫時，宋即不置可否，<sup>39</sup> 或許就是組黨不成的訊號之一。1950 年初胡適對蔣廷黻顯現淡漠的態度，更令蔣「感到憤怒」，<sup>40</sup> 或許是幾許挫折與無奈的匯集。胡從 1949 到 50 年初對此刻意淡化，相比於蔣廷黻在日記之記載，顯然不欲外界知道他曾考量「出山」。同時，蔣廷黻認為蔣介石會長期下野，放棄政治領袖的權力威望以示負政治責任的態度，投注其支持在野勢力進行政治與經濟改革，更低估蔣介石濃烈的使命感，根本無法和領袖政治實權相分割；與政治競爭者之出現，將造成不可預料地變數，令蔣介石不會如此。

蔣介石認定「組黨」是「清理內部門戶」另一種同義詞與策略，重在糾合服從者為新團體之核心成員，藉以排除反對者勢力。其目的不在樹立競爭者，意在使黨內可能的分裂勢力喪失政黨資源憑藉，無所作為、無法競爭。這截然不同於自由主義者促進政黨政治競爭的態勢與思維。因此，二者雖同說組黨，但其內容及意涵迥異。因此，即便一時同行，終究分途。

---

<sup>37</sup> January 2, 1950, Tsiang Ting-fu Diaries 類似訊息也在 1950 年 3 月傳達給顧維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7 冊，頁 632。

<sup>38</sup> 〈雷震致胡適〉，1949 年 12 月 8 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頁 5-6。在該書信選集中處處可見雷震寫給胡適之信函，經常提及臺灣政情，是胡適瞭解臺灣政情的多種管道之一。

<sup>39</sup> October 18, 1949, Tsiang Ting-fu Diaries.

<sup>40</sup> January 26, 1950, Tsiang Ting-fu Diaries.

若由此觀察，從 1950 年 7 月起出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館長（curator）的胡適，在 1951 年 3 月致函蔣介石，一方面講一年來「教育自己」知己知彼（中共），一併提出正副總統選舉的憲法補救方法，勸蔣介石考慮對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新政黨」，第一步就是蔣辭國民黨總裁。<sup>41</sup> 胡適似未揣度蔣已不打「引外打內」牌，力求國民黨之「一」之心理，而強調他想勸諫統治者主題——「遵守憲法」，意在以憲法作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合法性及其號召依據。此論引起蔣之不快，唯其不欲開罪胡適，落自由主義者與美國人口實，仍優禮有加，並請周宏濤赴美處理毛邦初案，見到胡適時轉達蔣氏想法。<sup>42</sup> 但在政壇人士眼中，蔣、胡「思想上有距離，談不到合作。」<sup>43</sup> 正因如此，雙方各說各話，在下次見面時，胡仍決定要談清楚。

事實上，蔣此一態度在 1950 年代年度檢討時的日記，即知一二：

若黨務不能改造，則政治與軍事亦不能如今日之奏效也。不信黨務之腐敗與黑暗，以及為革命之障礙有此其甚者，若非澈底改造，誰能知之。立夫對黨失敗之責任誠不能恕諒，其蒙蔽欺詐之罪惡，猶不自知乎。此乃余用人不當，信人太專之咎，以致貽誤黨國至此，於人何責也。<sup>44</sup>

蔣介石主觀認定：從事革命事業，必須跟從唯一的領導者。反對他，就是「革命的障礙」、「不革命」，最嚴重的地步就是落入「反革命」，成為水火不容的敵人。凡與蔣介石存有權力衝突可能的競爭者，如彼此間又有私人恩怨，蔣之日記予以負面評價：研究系、保皇黨「餘孽」為報舊日「黨仇」，藉

<sup>41</sup> 曹伯言，《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124，1951 年 5 月 28 日。胡適順便請蔣介石多注意共黨出版書刊，並詢問蔣對其於 1950 年間精心撰寫之〈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發表於《外交事務》，為《中央日報》中譯刊載）一文意見。

<sup>42</sup> 汪士淳整理，《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342。蔣之回信大要，胡適日記載有：「尊函所言憲法問題，黨派問題，以及研究匪情，了解敵人等問題，均為目前急務。然非面談不能盡道其詳。」故胡適說「甚為客氣」，也嗅出「黨派問題，我的見解似不是國民黨人所能了解」之味。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143，1951 年 10 月 11、12 日。

<sup>43</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第 11 冊，頁 51，1952 年 7 月 13 日。

<sup>44</sup> 《蔣中正日記》，1950 年終反省錄。

由制憲及行憲施展「陰謀」以毀滅國民黨。<sup>45</sup> 如此推演下去，一切權力競爭者均為共產勢力「反蔣毀華」的馬前卒，敵我立場分明。胡適呼籲國民黨施行民主、推動政黨政治，在蔣眼中就非「書生之見」，甚且蘊含美國人操控政局之政治動機。在蔣介石眼中，與胡適相爭，即等同於排除美國勢力背後遙控，彰顯民族主義，在政治行動還是思想價值均然。

當蔣介石、胡適於國民黨完成之後二月—1952年12月13日見面時，雙方仍是意見不合，且看蔣日記所載：

十時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持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幸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進午膳後別去。<sup>46</sup>

可惜胡適當日無記載，無從顯示內心想法，但雙方顯然見解相異。中共及背後隱含而未明指的美國，顯然是蔣介石所針對之目標。這兩個小時的談話與午餐氣氛，並不愉快。

1953年1月中，胡、蔣再度會見，蔣倒在日記載有胡適五點談話內容，蔣坦承在標語觀點之外，其他部分是「金石之言」。在胡適日記，特別著重在諍臣與言論自由之必要（要蔣容忍異見），以及擔憂蔣詢問國民大會召開可以做什麼事。胡一聽蔣表示「請你早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之言萌生「驚異」之感，擔憂「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sup>47</sup> 系列談話顯示兩

<sup>45</sup> 《蔣中正日記》，1950年7月4日。另一則日記（1951年1月25日）提及共產黨也是舊日保皇黨研究系餘孽，二者合謀毀蔣。

<sup>46</sup> 《蔣中正日記》，1952年12月13日。在9月下旬，蔣即認為胡適主國民黨仿土耳其之例分為兩黨之說，為「書生之見」。《蔣中正日記》，1952年9月23日。按1948年4月初，胡適即建言，國民黨宜分裂成二或三個團體從事競爭。蔣當時無回應。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冊，頁709，1948年4月8日。

<sup>47</sup> 《蔣中正日記》，1953年1月17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277，1953年1月16日。

人關切重點有異，胡重在落實憲法，維護人權，與領袖權力是否受憲法制衡，是以西方憲政觀點衡量臺灣政制；但蔣關切一位領導人如何維持領導權的穩固不受挑戰，即接受一定程度的諍諫，一旦構成權力的威脅與挑戰，就萬不可行。儘管蔣、胡對於自由與反共關連，是手段與根本有根本差異，但暫除分裂國民黨因素，蔣尚未遭逢憲政將可能妨礙其權力行使與地位問題，尚可細思衡度，仍可肯定胡適所言。胡適「諍諫」者，一為汪裕泰茶號汪漢航（胡適堂外甥）因臺灣外匯管制遭保安司令部以「套匯圖利」拘捕，胡適向高層直陳保安司令部作法爭議，妨害基本人權；<sup>48</sup> 一為與反共與自由關連、「毀黨救國」有關。蔣至少此時尚對胡之「諍」，是有一定的認可，由此觀之，蔣介石尚非幾乎無一正面評價。<sup>49</sup>

蔣介石對胡適在美國肯定與支持其領導政府，體念在心，對胡適仍予肯定及拉攏，定時贈胡節金一點或可為例。胡適於 1950 年 5 月間與老友朱經農見面，知朱投遞二十封謀職信，十五封回信拒絕，五封形同拒絕，胡於日記稱「此事使我慨嘆」。<sup>50</sup> 胡之感嘆顯然是「物傷其類」，也知道要找與其在美

<sup>48</sup> 胡在 1951 年 9 月 11、13 日記張貼軍司法審判劃分原則新聞，及憲法第九條條文是事出有因。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137、138。按汪裕泰茶號之汪立政、汪自新父子與胡適同為績溪上莊人，族誼交情匪淺。茶莊於 1949 年前事業跨足海內外，在臺建立分店及茶場，美國與歐洲亦設分銷系統。汪漢航為友人代換美金，遭保安司令部以開出港幣支票「套匯圖利」予以拘捕。胡獲悉訊息，認為在罪證與拘審程序均有嚴重瑕疵，致信臺灣黨政高層陳雪屏、吳國楨、蔣經國等，促其徹查保安司令部不法。（〈致雷震函〉1951 年 8 月 11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24；「胡適函陳雪屏吳國楨蔣經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查獲堂外甥汪漢航開出的港幣支票作為套匯圖利之證據盼望三位設法清查案裏串同栽贓誣陷良民的真相」，文件—忠勤檔案，〈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53-050；「胡適函陳雪屏吳國楨把三項金融罪交給有軍法審判權的軍事機關審判每破獲一案告密者得獎金這是政府立法鼓勵保安司令部及刑警隊一類機關去造作圈套誘民犯罪此是國家命脈問題不可忽視」，文件—忠勤檔案，〈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內文件（四）〉，《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53-051。匯兌事件後，茶莊所屬竹北茶場及茶行陸續停止營業，茶場於 1955 年 10 月遭新竹縣政府註銷許可證。1959 至 61 年間，茶行因未定期申報存貨遭到停止結匯三月處分。見《聯合報》，1955 年 10 月 6 日，版 4；1961 年 10 月 7 日，版 5。

<sup>49</sup> 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頁 19-21。

<sup>50</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32，1950 年 5 月 22 日。朱後靠聯合

國要找與中國聲望地位相符的工作，極為困難。出任圖書館館長並不是他的優先選擇，在美國校務行政系統也不受重視，卻也不得不然。當時在美國讀博士的唐德剛說到：美國排華法律並未全然除去，種族歧視之風猶存，這些中國要人在美實謀生乏術。唐亦稱，有哥倫比亞大學美籍教授表示「胡適能教些什麼呢」？<sup>51</sup> 的確，美國學風已在 1950 年代講求社會科學、行為主義，與胡適所熟悉的 1910 年代的以歷史哲學式為主的社會學科有相當大的變動。此一現實，胡適焉得不知？亦有美國東方學主持人認為胡適親國民政府，立場不夠客觀，將胡排除在討論學者之內。這些事情胡適自是清楚的。受困現實，胡適只能先求貼補家用，再靠短期講學、零星演講機會維持一定活動力。<sup>52</sup> 但要靠教書、校務行政獲得穩定生活，幾已不可能。與胡適同期取得公費留美之趙元任，已於 1954 年間入籍美國，為了爭取胡適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講學，四處奔走徵集 12 人聯名簽字，才獲得校方許可擔任短期客座教授。<sup>53</sup> 這是胡適最後執教紀錄。短期講座，都勞老友費心張羅，胡適感戴之餘也不免感觸。因此胡適葛斯德圖書館中文藏書部館長聘期屆滿後，日子過得並不輕鬆。

蔣介石之慷慨解囊，胡適實心知肚明。有相關檔案可查知記載如下：1951 年命令在美國的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副執行董事、國際貨幣基金副執行董事俞國華致贈胡適美金 5 千元。並於胡適六十歲生日時派俞國華、總統府機要室主任周宏濤往賀祝壽，致贈五千元，先前更請周宏濤探望胡適，請其密舉「於經濟、工礦與社會等各部門有學識、有毅力，能設計督導之學者」。<sup>54</sup> 顯然

---

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協助在康乃狄克州安居，1951 年 3 月 9 日過世，逝世之後，蔣介石曾致贈賻金二千元。〈胡適致趙元任函〉，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6 冊，頁 2167，1951 年 3 月 29 日。

<sup>51</sup>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45-46。

<sup>52</sup>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12；〈胡適致趙元任函〉，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560，1956 年 11 月 18 日。

<sup>53</sup>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342、344。事實上，趙元任希望安排胡適再去加大客座，但胡已計劃赴臺灣長居，故予婉拒。

<sup>54</sup> 「蔣介石電俞國華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適陳立夫美金各五千」，1951 年 5 月 15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346-007；「蔣介石電俞國華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適陳立夫美金各五千」（1951 年 12 月 11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347-027；

致贈「節金」是蔣以國家元首地位對胡以示崇榮，也有拉攏他、期盼他提供政治諮詢之意。畢竟在蔣介石 1949 年下野前五天聘任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交往管道名正言順。既為「資政」，胡可依此身分建言，蔣可表示親近。1951 年更值國民黨改造期間，蔣希望落實引入新人才以改造國民黨，有此徵詢倒不令人感到意外。即便胡適 1952 年初返國與蔣會談，有不同意見後，蔣仍請俞國華贈款五千元，<sup>55</sup> 顯示蔣並未因此就改變對胡的協助。按周、俞在美為蔣轉交贈款對象尚包含顧維鈞、陳立夫、于斌、于峻吉等人。在 1953 年 7 月、1954 年之 5、9、12 月、1955 年 5 月又各致送 5 千元。<sup>56</sup> 以現有資料合計至少 3 萬 5 千元，即以低於實價的官定匯價新臺幣 15.65 元計算即新臺幣 54 萬 7 千餘元。

蔣介石花心思與胡適往來，乃盼透過爭取胡適，一併爭取海內外知識界支持，加強反共領袖的正當性；一併營造改革形象，爭取親美人士與美國的支持。何況胡適在美，也並非完全斷絕與政界人士往來見面，鼓動他接受美國支持成為新領導者的活動、外間揣測他參與第三勢力的傳言並未斷絕。<sup>57</sup>

---

「蔣介石電周宏濤請胡適舉薦經濟社會工礦外交各部門有學識毅力之學者五到十人又請積極籌備空軍調查會待成例後再回國」(1951 年 11 月 26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347-024。

<sup>55</sup> 「蔣介石電俞國華即送胡適美金五千元」(1953 年 2 月 5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二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349-005。

<sup>56</sup> 「蔣介石電俞國華代發陳立夫胡適美金各五千元託譚伯羽代匯鷹屋三千元」(1953 年 7 月 17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二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 002-080200-349-021；「蔣介石電示俞國華發胡適于斌各美金五千元」(1954 年 5 月 1 日)，〈戡亂時期(二十二)〉，分類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22-041；「蔣介石電令俞國華即送胡適美金五千元」(1954 年 9 月 3 日)，〈戡亂時期(二十三)〉，分類籌筆—戡亂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23-026；「蔣介石電俞國華本月底撥予胡適陳立夫各五千元」(1954 年 12 月 6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三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002-080200-350-114；「蔣中正電俞國華本月底撥予胡適陳立夫各五千元」(1955 年 5 月 11 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四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351-061。

<sup>57</sup> 1951 年 11 月 15 日附貼剪報、1952 年 5 月 7 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144-146、228。



胡適儘管表示，在共黨與反共勢力的生存戰中沒有第三勢力活動空間，無法發揮影響力。但各方勢力爭取胡之用心，自為蔣介石看在眼裡，也有所戒心，甚至到 1954 年第二任總統選舉時、1955 年孫立人事件可能引發反響，蔣隱然對胡適抱持戒備，<sup>58</sup> 並非偶然。但此時國共對立、冷戰局勢分明，「不是敵人，就是朋友」，蔣介石必須拉攏同情者結盟。

早在胡適 1951 年間為《自由中國》刊登〈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風波中，稱讚〈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好文字」之餘，察覺社方受政府施壓被迫刊登帶有屈辱性社論（〈再評經濟管制的措施〉），嗅出新聞自由遭到戕害，辭去「作偽」的發行人以示抗議（亦卸除虛名）。雜誌社方期盼胡「積極領導」遊說之餘，終於 1952 年底同意於 53 年初變更發行人，雷震正式擔任發行人，扛下言論責任。<sup>59</sup> 政府高層於 1951 年間怪罪社方處理不周到之餘，亦由陳誠出面安撫遠在美國的胡適。這番動作顯示胡適言論行動，至少在國民黨政界人士觀之是動見觀瞻。<sup>60</sup> 《自由中國》與胡適的關連交往，高層也未視若無睹。

胡適接受英國教席與否，也成為蔣胡關係進一步發展的催化劑。1952 年 8 月下旬，接到英國牛津大學杜布斯（亦名德效騫，H. H. Dubs）再度函詢，願否接受推舉為牛津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講座教授候選人？且杜氏委請房兆楹勸駕。胡適本已回信接受，稍後想及英國承認中共政權，即將相關信件及複本交外交部長葉公超，請與王世杰、羅家倫、蔣介石商量，接受與否？至 9 月 11、12 日相繼接到葉、王之電話與電報。胡適最終去函回拒。<sup>61</sup> 其實，胡適若積極想去英國，應會更早採取行動，到 1952 年要從普大離職必須考慮

<sup>58</sup> 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頁 22。

<sup>59</sup> 〈胡適致雷震函〉，1950 年 1 月 9 日、〈胡適致雷震函〉，1951 年 8 月 11 日、〈雷震等致胡適函〉，1951 年 9 月 6 日、〈雷震致胡適函〉，1953 年 2 月 2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9、23-24、26-27、36；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34 冊，頁 164，1952 年 11 月 28 日。

<sup>60</sup> 相關介紹，參見林淇濤，〈從「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試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機器的合與分〉，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26。

<sup>61</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245-246，1952 年 8 月 30 日，9 月 11、12、13 日。

下一個去處時，他對牛津席位的態度較前積極。但此職接受與否，自是轉換生活環境，事關重大，又與「國格」問題結合一體，讓他覺得透過朋友詢問及尊重蔣介石意見是必要的。當蔣不同意胡赴英，胡等於是作一種犧牲一退休，蔣在道義上也就對胡的生活有其協助理由。

事實上，胡適當時難以拒絕蔣介石的私誼往來及金錢餽贈。畢竟胡適夫婦年紀漸長，胡又有心臟病，不堪勞鉅。他們靠有限儲蓄與少許養老金維生，只要生一場病，醫療花費雖可仰賴醫療保險，卻也得擔心自付支出。就算如唐德剛所言「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也不得不審慎面對自己的財務狀況，也不止一次諄諄告誡：「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sup>62</sup> 胡適有強烈自尊心，不輕易向外界告白財務，只在 1956 年對趙元任說出真心話：「我有一點小積蓄，在美國只夠坐吃兩三年，在臺北或臺中可以夠我坐吃十年而有餘」。<sup>63</sup> 但生活所逼，對最高領導人蔣介石藉名目所予贈金也不得不收。由此亦顯示，胡適在蔣眼中是具有高度政治意義與學術象徵作用，使蔣對其確實尊重有加。晚至 1957 年，胡適借錢予趙元任動膽結石手術。事後，趙欲還錢，胡反稱不急於一時，因為胡有兩份醫療險，並可因身為中華民國資政，由國家「負擔剩餘醫藥費」。<sup>64</sup> 胡適回函顯係欲老友放寬心，含糊帶過金錢問題。顯然，胡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蔣氏贈款以避嫌，即便對多年老友亦不例外。

1954 年中共的批判胡適運動，讓蔣介石跟胡適就更難分開。以大規模發動的批判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全國性政治運動，自是標誌胡適和中共不可能

---

<sup>62</sup>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49。胡適在 1961 年生活穩定後，向秘書透露，有七、八千美金交高宗武經營股票，但從未結過帳。胡於 1950 年代中期致函高宗武切勿急於結清營利。夏侯敍五編注，〈胡適與高宗武往來書信〉，頁 89-91。趙元任夫妻美國生活，可參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相關記載。

<sup>63</sup> 〈胡適致趙元任函〉，1956 年 11 月 18 日，收入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560-2561。趙元任夫婦住在美國西岸，要支付房屋貸款，考到駕照駕車活動，即因趙元任有教職固定收入，經濟狀況已屬穩定。

<sup>64</sup> 〈胡適致趙元任函〉，1957 年 6 月 19 日，收入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586-2587。蔣介石曾請董顯光慰問休養身體的胡適，洽詢醫藥費金額，可茲旁證。「蔣介石電董顯光代慰胡適病情並詢醫藥費金額」（1957 年 3 月 31 日），〈戡亂時期（二十七）〉，籌筆，《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10400-00027-028。

走在一起，也讓胡適在和中共敵對人士眼裡，更有爭取的價值。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忽視：1954 年蔣介石連任總統，胡在道義及情感均支持蔣連任，而且回國參與國民大會，擔任主席團主席，以行動支持反共的政府實行憲政程序。他在此時也參觀了中央研究院倉庫興建工程。在吳國楨發言抨擊蔣介石領導時，胡也發言表示指斥吳在國外說謊，<sup>65</sup> 再度在道義與實質上予以蔣以支持。但蔣胡彼此關係，總說起來雖小有波濤，仍在穩定發展。

## 肆、緊張關係推升（1956.10-1958.4）

1956 年 10 月 31 日《自由中國·祝壽專號》出版，胡適言論及刊物相關後續風波，當是蔣胡關係再次轉變之重要指標。是故，將再度緊張的關係提前應屬合理。此後，可說是胡適測試蔣介石容忍底線，蔣愈發不服輸。以下陸續從幾項事件鋪陳雙方關係之逐步變化。

胡適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後，雷震胡適聯繫未斷。雷仍寫信邀胡撰稿或催稿，敘述社務及臺灣政情。胡適亦回函，如請雷震注意尹仲容及胡光熙案件，介紹後者與雷見面；1956 年，胡更捐款二百美金予《自由中國》，<sup>66</sup> 顯示雙方聯繫之密切。1956 年 10 月，胡適在《自由中國·祝壽專號》撰文秉持《淮南王書》重點，希望蔣要少管事，顯示胡適對蔣觀感如故。看在當時立意規劃反攻大陸的蔣介石，何能接受此一說法？無怪有論者稱，將國民黨人的祝壽舉動相比於胡適等人的言論，後者是書生意氣和不合時宜，公開談領袖的缺點更像「自討苦吃」。<sup>67</sup>

當事人之一蔣介石如是想：「今後對於自由文人之政策，只要其無匪諜嫌疑與關係者，則其反對政府與惡意批評者皆可寬容不校，以此時反蔣之惡意

---

<sup>65</sup> 〈胡適函吳國楨〉，轉引自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下冊，頁 1233-1237。

<sup>66</sup> 〈胡適致雷震函〉，1955 年 11 月 28 日、1956 年 4 月 1 日，收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86、92。

<sup>67</sup> 陳漱渝、宋娜，《胡適與蔣介石》，頁 143。

言論，不能減低政府之權威也。」<sup>68</sup> 在他 12 月 26 日第 43 次反共抗俄總動員會議指示：「邇來海內外報刊對本黨與政府頗多批評，各單位主管均應指定同志隨時蒐集研究，如屬正確的批評，應即採納改進，如係共匪份子故意誣蔑，亦應根據事實，加以辨明，以正視聽」。看似氣度寬宏底下之重點實在「辨正誣衊」，<sup>69</sup> 或許也是選擇性適用。個人日記更像自勉及提醒有「風度」。但是，關鍵在如何界定「有匪諜關係與嫌疑者」？「惡意」的認定及如何「予以反擊」？若由 1957 年初官方系統發動「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等活動，與打擊視胡適為保護傘的《自由中國》，顯與日記自我期許有異。這股打擊令胡適無法自外，一併反應在胡適的健康狀況。1957 年 2 月 7 日，胡適將一篇敘述《自由中國》在臺灣遭到抨擊的香港剪報貼入日記，顯然感受臺灣政治氣氛之惡劣。七天後，胡適病倒，便中帶血，2 月 17 及 18 日又因胃潰瘍大吐血，2 月 19 日動手術割去十分之六的胃，3 月 11 日出院靜養。<sup>70</sup> 胡適犯胃潰瘍，從發作到住院時間，和《自由中國》相關風波發展相吻合。

研究者指出：官方系統曾讓黨政軍政工機構專責審查非國民黨人主辦及控制的政論刊物，對之採行積極的言論攻勢。當蔣介石既然說「辯正」，政工系統便做為主力積極進行，救國團及黨營媒體亦有動作，但黨宣傳機構為免落人口實、顧及國內外輿情觀感，處理胡適及《自由中國》言論仍相對持重，政戰系統就動作頻頻。<sup>71</sup> 這讓資深報人、立法委員成舍我以筆名范度才（諧音反奴才）撰文回擊黨營媒體言論，即稱政工系統「姿態與方法，很像過去大陸上之清算胡適、圍剿胡風」。<sup>72</sup> 其中一段插曲是，蔣此時看到蔣經國寫

<sup>68</sup> 《蔣中正日記》，1956 年 11 月 28 日。

<sup>69</sup> 分見敬禮，〈何以沒有讀《自由中國》的自由？〉，《自由中國》，第 15 卷第 10 期（1956 年 11 月 16 日），頁 31；〈中國國民黨第七屆 210 次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紀錄〉，1956 年 12 月 20 日，黨史館藏，油印本，檔號：會 7.4/210；〈第 43 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議紀錄〉，1956 年 12 月 26 日，黨史館藏，油印本，檔號：會 7.6/55。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39 冊，頁 3。陳永發院士面告，儘管黨方下令，但各中等學校禁閱實施情況並不一致。

<sup>70</sup> 〈胡適致朱家驊函〉，轉引自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578，1957 年 3 月 21 日。

<sup>71</sup>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頁 245-250。

<sup>72</sup> 曹聖芬在《中華日報》抨擊《自由中國》劉博崑〈清議與干戈〉一文，激發成舍我撰寫〈《中華日報》鼓吹暴動——敬答《中華日報》社長曹聖芬先生〉（《自由

的《我的父親》書名，還擔憂此書名稱與胡適《我的母親》太過接近。<sup>73</sup> 注重修養與文辭的蔣介石顯然很在意，不欲外界有「跟風」胡適之議。

在《自由中國》被軍方政工單位圍剿，黨宣傳機構的注意下，胡適此時仍與雜誌站在同一陣線，也認真研究定居臺灣。早在 1956 年 6 月下旬，胡適和梅貽琦在紐約見面時，談到有意回臺久居。<sup>74</sup> 他希望住在臺北近郊，就近利用中研院史語所相關資源完成《中國哲學史》與《水經注》。他「不管別人歡迎不歡迎，討厭不討厭」，都要回臺灣。1956 年底，胡適寫信回覆不太贊成他回國的老友趙元任，明言「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重要……或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有人對 1952-1953 所說過的話「至今還記在帳上，沒有忘記」。<sup>75</sup>

對照寫信時間解讀所發生外在大事，與 1952-53 年所說的話，即知前者係處在政戰系統「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自由中國·祝壽專號》風波等事件交疊期間，顯然人在海外，關注臺灣政情的胡適知道，外間打擊矛頭看似針對《自由中國》與自由主義者，其實也正對他而發。特別是《自由中國》1955 年起，逐步加強對國內政情的分析與批判，不再一味為顧及生存環境有所妥協，加以《自由中國》實際主持者雷震卸除公職、被國民黨註銷黨籍，不再是執政者的扈從，純粹是議政者，發言立場的轉換是相當清楚的。胡適既然常叫學習人文法政的海外留學生「為雷徹裏寫寫文章」，<sup>76</sup> 足見他相當清楚刊物立足臺灣之關鍵意義及象徵。胡適與執政者在 1952-53 說的，也就是憲政秩序、言論自由、政黨政治等自由主義者所在意的基本理念。自由主義者與執政當局對這幾項的不同觀感，也就是在日後彼此歧異仍然無法解決的，即使胡適回國，顯然也無法造成根本改變。此種即時的真心真意，在胡適日

---

中國》，卷 16 期 4，頁 15-18）回擊。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39 冊，頁 11。

<sup>73</sup> 《蔣中正日記》，1956 年 12 月 3 日。

<sup>74</sup>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7，1956 年 6 月 23 日。

<sup>75</sup> 住臺北郊外，是胡適主動提出，參見〈胡適致李濟函〉，《胡適書信集》，中冊，頁 1294；〈胡適致趙元任函〉，1956 年 11 月 18 日，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560；〈胡適致趙元任函〉，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 1320，1957 年 7 月 26 日。

<sup>76</sup> 唐德剛，《胡適雜憶》，頁 77。

記中卻未見絲毫表露，不可不謂是一特殊現象。但，胡適返臺定居，也是以行動表示支持《自由中國》在臺繼續發聲。

## 伍、衝突及破裂（1958.4-1962.2）

出乎胡適意料之外，表達回國意願後未回學界，而是作為臺灣學術行政的最高領導人。胡適與蔣介石關係，因其返臺定居產生直接衝突，終致破裂。

1957年8月4日星期天下午，蔣介石突襲巡視中研院，眼見院士會議指示改善院內道路與庭院未見改進而怒氣洶洶，<sup>77</sup> 時任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只得請辭以示負責。<sup>78</sup> 朱氏辭職，讓散居海外與研究院相關人士心有不滿。胡適在日記中表示「海外六個評議員，都很憤慨」。有些院士包括胡適在內最初不擬投票，但趙元任勸解甚力，病中的胡適終於委託王世杰在評議會投票，也故意投票給朱家驊、李濟、李書華。<sup>79</sup> 此舉明示自身清白及其「學術獨立」之堅持。胡適從1949年赴美後，一直以學術界領袖身份探訪研究人才、為中研院籌措建築經費、恢復中研院院士制度，順利以全票十八張名列三位候選人之首，活動甚力的張其昀遭到排除。<sup>80</sup> 蔣介石也透過總統府祕書長張羣轉達全體推舉胡適出任中研院長之期望。<sup>81</sup> 在蔣介石圈選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初表推辭，但友好包括趙元任、梅貽琦在內均勸其就任，<sup>82</sup> 胡終於

<sup>77</sup> 《蔣中正日記》，1957年8月4日。

<sup>78</sup> 楊儒賓、陳華編，《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頁233，1957年8月21日。

<sup>79</sup> 〈胡適致趙元任函〉，1957年10月22日、〈胡適致楊樹人函〉，1957年10月22日，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1324、1325；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499-500，1957年10月22日。

<sup>80</sup> 梅貽琦確實先投張其昀，再投李書華。但第幾次投李存有二說。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1卷（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頁86-87；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144-145。梅貽琦在日記中僅提及11月1日張其昀為慶賀李政道得諾貝爾獎請客事。11月3日投票結果，第三次張其昀獲得七票，楊儒賓、陳華，《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頁257-258。

<sup>81</sup> 楊儒賓、陳華編，《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1957年11月11日。

<sup>82</sup>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頁352；〈胡適致趙元任函〉，1957年12月15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1328。

表示同意，於身體調理康復後的 1958 年 4 月回國就職。胡所住房屋也於 1958 年 2 月開始動工，由行政院通過中研院增撥經費支應；此前蔣介石表示願撥出《蘇俄在中國》版稅作建屋之需，都表示對胡適之優禮。<sup>83</sup>

事實上，梅貽琦之勸說胡適出任學術最高領導—中研院院長，關鍵就在人選。<sup>84</sup> 一旦中研院的李濟、李書華都不作，就可能輪到張其昀。張之學術背景（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曾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長）政治經歷（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祕書長、教育部長），或為擁有投票權的評議會成員趙元任、梅貽琦（曾任北京、清華大學教授）不欲張出任中研院院長原由之一。<sup>85</sup> 因此，必須勸說胡適出任中研院院長。

1958 年 4 月 8 日，剛下飛機的胡適向記者表示，不回答有關政治與反對黨問題，9 日蔣與胡針對學術與辦理大學談話一小時，氣氛融洽。<sup>86</sup> 但 4 月 10 日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揭幕（稍前胡適就職院長），氣氛迥異。會議致詞風波，顯然打破胡適營造友善氣氛之預想，也成為蔣胡間緊張關係持續之重要關鍵。蔣介石於院士會議致詞提及，胡所參加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在臺灣應復興中華文化，<sup>87</sup> 將打倒孔家店和中共清算胡適相比較，引

<sup>83</sup> 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7 冊，頁 2637。

<sup>84</sup> 〈胡適致李濟函〉，1958 年 1 月 4 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冊，頁 1333。事實上，梅貽琦、錢思亮跟王世杰商量過，認為胡適之外，別無其他適當人選，即便是李書華也未必能過得了其他評議員的關口。梅貽琦更致函遊說胡適。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頁 242，1957 年 9 月 21-22 日。

<sup>85</sup> 余英時提到，中研院是自由派學人學術事業唯一堡壘。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頁 145。這可能同時意涵以北京大學為核心的組織，在中國長期的「南北之爭」（地理、學術師承關係等）大環境下，所謂北方學人以胡適為精神領袖之表現。唯南北之爭並非本文討論主旨，望識者諒察。

<sup>86</sup> 《聯合報》，1958 年 4 月 9 日，版 1；《蔣中正日記》，1958 年 4 月 9 日。

<sup>87</sup> 《中央日報》，1958 年 4 月 11 日，版 1。事涉總統講詞，臺灣各報採用中央社通稿。相近時空出現《胡適與國運》，更增想像空間，如雷震即認為出版此書是官方「兩套」手法之證。〈雷震致胡適函〉，1958 年 4 月 26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127。但《胡適與國運》主稿作者徐子明（海德堡大學史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反胡」理念一貫，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導致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秩序崩潰與共黨興起原因，成為統治者思想同路人或屬巧合。徐氏論點被視為老派學人，在歷史系上並非意見主流。同校教授王夢鷗、周德偉私下反應對胡行事風格與學問人品批評，如「國家待胡太厚，胡對

發胡適批評。<sup>88</sup> 針對此事，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以旁觀者角度表示，胡適演說「針對總統所囑咐科學家應對於文化道德盡其保持維護一語，注重為大家應對學術努力，詞句稍欠圓到耳」。<sup>89</sup> 梅貽琦注意到雙方言詞交鋒，也站在理解胡適言詞用意的一方，著重在「對學術努力」一方，僅認為胡適態度要更為圓融，以不損賓客情面。胡適會有如此即時反應，在於無法忽視統治者要將學術以「反攻」為由，控制在手之意涵。當面進言，是他自認為身為總統府資政，以及處在總統府直屬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所應做之事，就不管執政者聽進去與否。這也是梅貽琦理解並贊同之基本價值。此外，蔣隱對胡適視為「中國文藝復興」之新文化運動不滿，應為胡適察覺，故予回擊。

三天後的4月12日，蔣宴請中研院評議會、院士等人，胡適、梅貽琦均出席，列為主賓之首，梅貽琦記載「亦榮幸事也」。但蔣介石再度表露對胡之不滿，以為其「狹小妒嫉一至於此，今日甚覺其疑忌之態可慮」。梅打圓場，答謝蔣派機載運學者離京之舉，蔣稱胡適聆言「並無表情」。蔣在日記推獎蔡元培「安詳雅逸」、「不與人爭」，<sup>90</sup>「爭」之關鍵，盡寓其中。

---

國家太薄」，但不致公諸於文。汪榮祖，〈懷念宜興徐子明先生〉，《學林漫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241；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1950-1970）〉，《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46期（2010年6月），頁129；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107；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134-135、324。

<sup>88</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4月10日。當時在場的呂實強回憶，如非陳誠抓住蔣之衣袖，提醒蔣要強自隱忍，使蔣未拂袖而去。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頁213。蔣之忍，或如其所言是「為國效忠，努力反共」。《蔣中正日記》，1958年4月12日，上星期反省錄。

<sup>89</sup>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2，1958年4月10日。按梅貽琦日記記事一向簡約，公眾場合不喜發表議論。梅祖彥，〈寫在本書出版前的幾句話〉，收入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III-IV。

<sup>90</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3月12日。據學者觀察，1930年國民政府曾欲強制中研院集中南京，欲逼1928年7月起住在上海的蔡元培赴京，再由1949年後政府當局對蔡元培「尊而不親」，甚至某意義上是「防範有加」。陶英惠，《中研院六院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年），頁150-153、170-171。因此，蔣氏對蔡元



事實上，蔣在院士會議所言，與青年節講詞部分主旨雷同。他當時表示復國建國的基本條件乃在「民族傳統（自由獨立精神）與固有道德（禮義廉恥）之恢復與充實」；維持倫理道德與責任紀律，才是保障民主自由的基礎；「民主自由必須以大我為重小我為次」。蔣甚覺「自得」。<sup>91</sup> 是故蔣 4 月 10 日發言並非臨時起意，係有所醞釀與思想連貫性，不可以武人思想一概而論。蔣介石將學術與政治劃定從屬關係，將可能使學術潛藏喪失獨立空間，令受過西方教育薰陶的自由主義者無法接受。胡適不欲在政治人物面前示「理」之弱，「爭」乃必然舉動。

4 月 18 日，針對出版法修訂問題，胡適受訪，表示修訂出版法為不必要，更宣示和當局站在不同立場。<sup>92</sup> 5 月 27 日，胡適在《自由中國》歡迎會講演，既提到雜誌「今日的問題」系列，不必急於碰觸「反攻大陸」問題，以傷害海內外人士的期望，畢竟世局多變，可以樂觀看待；「反對黨」不必仰賴既有政治力量（包括國民黨派系裂解、或友黨強大），可由教育界、知識分子、青年人組織不希望取得政權的在野黨。最後一併帶到修改出版法是「技術的錯誤」。<sup>93</sup> 胡適話中雖有針對刊物言論之不同意見，仍肯定刊物爭取言論自由之努力成果及其存在關鍵意義（民主反共）；再以「爭取」期勉與會眾人繼續爭取言論自由，顯然也對當前執政者提出建言。

出版法修訂，也在蔣介石計畫之外，因為他正規劃黨員重登記，以肅清內部黨紀，卻冒出計畫外的出版法修訂案，與當時政局交疊，事情變得複雜，徒然予「反動派詆毀」良機。4 月 21 日，蔣決定因應常會通過出版法修正案情勢，先使修正案通過立法，再談黨員重登記。<sup>94</sup> 從日記中顯示，他的確在這段期間為出版法與重登記問題煞費心神，甚至動氣認為是反黨的叛逆行動。<sup>95</sup> 蔣介石顯然對胡適反修改出版法發言耿耿於懷，認為「助長氣焰」，因此在 5 月間寫下一段情緒性文字：

---

培之真實觀點，顯與此日記載有異。

<sup>91</sup> 《蔣中正日記》，1958 年 3 月 25 日、3 月 29 日。

<sup>92</sup> 《中央日報》，1958 年 4 月 19 日，版 1。

<sup>93</sup> 胡適講，楊欣泉記，〈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 18 卷第 11 期（1958 年 6 月 1 日），頁 9-10。

<sup>94</sup> 《蔣中正日記》，1958 年 4 月 18 日、4 月 19 日後上星期反省錄、4 月 21 日。

<sup>95</sup> 《蔣中正日記》，1958 年 5 月 15 日。

對於政客以學者身分向政府投機要脅，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於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於此矣，殊所不料也。總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討錢，而特別要以獨立學者身分標榜其廉潔不苟之態度，甚歎士風墮落人心卑污，此其共匪之所以幸勝，而國與民皆遭受此空前之浩劫，能不痛心？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sup>96</sup>

蔣已將胡適和前民主同盟、第三勢力參與者相比擬，視為「政客」，並指責胡適是「士風墮落」的代表，導致共黨在中國大陸獲勝。若探究蔣何以將胡與左舜生、伍憲子相等同？或許部分因素在於：在香港的伍憲子、左舜生受困於財務窘境，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國民黨方的金錢餽贈，妥協軟化，<sup>97</sup> 為蔣介石所鄙。蔣既贈款助胡，無形間亦有胡「應當妥協」之感，但胡的「諍言」在蔣眼中顯然是在「爭」，雙方又不能在公開場合鬧開，方藉貶胡揚蔡，以消心中怨氣，正好反應蔣好勝心之強烈。

胡適的「毀黨救國」言論，在蔣介石、胡適已有衝突之關係中，再度火上加油。5月底，胡適重提「毀黨救國」論，蔣介石從蔣經國處獲悉後更光火。<sup>98</sup> 5月31日，父子二人思前想後，蔣介石決定「為過去關係，余對胡應有一次最後規戒之義務，盡我人事而已」。但要由誰去「規戒」「狂妄」的胡適？大概在6月3日的《蔣介石日記》顯露蛛絲馬跡：總統府祕書長張羣或副總統暨國民黨副總裁陳誠。蔣介石怒謂：國民黨創建了中華民國，亦責無旁貸保全國家，國民黨人更視黨為第一生命，怎可要黨人做出毀黨此一形同毀滅祖宗之事？<sup>99</sup> 蔣介石之深層心理更為在意胡適高姿態評論國民黨務發展方向，牴觸其權威。從蔣剖析出版法修正案通過成敗，略見端倪：「黨內外反動份子大聯合運動經過兩月以上的挾攻，所謂民主自由人對我黨製造矛盾企圖喪失領袖威信分裂革命勢力的陰謀，因昨日在立法院三讀正式通過而激

<sup>96</sup> 助長氣焰見《蔣中正日記》，1958年5月反省錄；《蔣中正日記》，1958年5月10日。

<sup>97</sup> 〈張其昀、張炎元呈為對李大明談話等最近動態簽擬處理意見乞核示〉，1953年3月10日，《總裁批簽》，黨史館藏；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冊，頁851-852。

<sup>98</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5月29日。

<sup>99</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5月31日、6月3日。狂妄語出1958年6月6日。

底粉碎」。<sup>100</sup> 蔣既然認為，爭取言論自由是反黨人士的幌子，骨子裡是美國人主使製造國民黨內部矛盾，意圖破壞領袖威信。依此言之，胡適言論就十足是對其領導權威之挑戰，蔣之好勝心與捍衛國民黨使命感交融，對蔣而言，與胡衝突難免，但作法可再研究。

6月6日，蔣介石與陳誠兩人在角板山共進早餐，商談組閣問題，一併談及胡適問題，還是不認同胡之「毀黨救國」論，蔣介石決定予以冷處理。<sup>101</sup> 該案通過後的6月底，蔣在「上月反省錄」再度提及不予回應，如此一再確認，顯欲提醒自己「勿因小失大」。這種不予回應，也包括對於雙方見面會晤行禮如儀的策略在內，至少反應他對胡適印象與評價已趨負面。<sup>102</sup> 在1959年，胡適（中研院長兼任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與蔣介石面談長期發展科學問題，蔣雖禮貌邀宴，但蔣藉故推辭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開幕詞，僅以邀宴院士回應，故示「不接不離」，<sup>103</sup> 就是策略作用。

1958年7月間，張其昀提及，無法留任教育部長係因北大派（胡適為首）作梗。蔣介石認為這是「胡適等反黨分子對黨的重大勝利」。但蔣更警戒於陳誠先行釋放訊息予胡適，副手竟與胡適如此友善，黨性及忠誠度何在？<sup>104</sup> 按陳誠6月7日同意再度出任行政院長，胡適於6月16日離開臺北前往美國，7月4日陳誠正式組閣，顯然陳、胡見面談及人事就在6月7日至16日之間。蔣因授權副手組閣，不便介入人事，以免激起陳誠不快。此後一年政府因胡適、梅貽琦、吳大猷等人倡議，研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領」，並在行政院之下設立「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初期經費以美援為主，負起基礎

<sup>100</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6月22日。按21日出版法修正案三讀通過。

<sup>101</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6月5、6日。

<sup>102</sup> 置之不理是蔣介石對厭煩者經常採用的應對方式。不理的深層原因往往在於此人所代表後臺與政治意義不可忽視，故需如此應對。如1944年10月蘇俄大使為新疆問題請見蔣，蔣刻意不見。秦孝儀總編纂，《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卷5上冊，頁408。

<sup>103</sup> 《蔣中正日記》，1959年7月4日，上週反省錄。也許蔣所謂「消極」，事實上並非如此。

<sup>104</sup> 《蔣中正日記》，1958年7月9日。要張離任，並非胡一人意見。1956年3月間，蔣廷黻至臺述職後返美，即向胡適表示張其昀是「不稱職的思想家與不稱職的教育部長」。蔣廷黻以《獨立評論》言，與胡適有一定淵源。March 28, 1956, Tsiang Ting-fu Diaries.

科學及科學教育研究方面之策劃工作。<sup>105</sup> 放在政治環境下，自可歸於蔣介石在政見之爭外，對於專業建議尚能釋放善意；以及自由派學者在美國資源挹注下，貢獻專業力量於科技發展。唯陳誠居中執行亦屬重要因素。胡陳互動機會即生。放在第三任總統將於 1960 年 3 月改選之政局，格外敏感。

1959 年間《自由中國》遭遇訴訟風波，亦令胡適關注有加，採取細緻手法處理事情。胡適在蔣介石刻意不見狀況之下，轉用公開傳話或透過中間人傳話表達立場，在在測試蔣介石寬容底線舉動，也加劇雙方歧異及衝突。可說蔣胡關係加入雷震與《自由中國》，涉及言論自由更難見改善可能。

胡適針對《自由中國》刊登讀者投書，遭到署名作者陳懷琪否認及興訟，一方面認為「此事不簡單」，指社方作法輕率之餘，卻也「費了好幾個晚上的工夫」，做出「比論文難寫」的〈容忍與自由〉以示「支持」。<sup>106</sup> 胡適請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協調之餘，更先寫信給雷震，要雷轉告社內同人檢討處理讀者投書、社論之編輯方法，停止短評，文章必署真名，該信且需立即發表。此舉自是要《自由中國》壓低姿態，雷表示「等於《自由中國》屈膝了」，終以停止短評釋放善意。雷震曾出庭應訊，胡適在雷震應訊前後表示關切，稱讚雷出庭應訊是「最文明」的舉動。訴訟案最終不了了之。<sup>107</sup> 胡在同年 7 月赴美國夏威夷期間，持續關注社方處理投書方式，<sup>108</sup> 亦見其關懷之切，與

<sup>105</sup> 張弘錫，〈行政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 年），上冊，頁 320。

<sup>106</sup> 〈胡適致雷震函〉，1959 年 2 月 19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162-163；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頁 12。的確，胡適在 3 月 9 日提及該文稿「不成」，11 日才勉強成文。1959 年 3 月 9、11 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567-568。「支持」是雷震語，本係欲爭取美國亞洲協會補助，陳懷琪事件後亦增添支持刊物之意。雷氏日後回憶卻僅強調後者。〈雷震致胡適函〉，1959 年 1 月 31 日、3 月 7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154、167。

<sup>107</sup> 信件全文見〈胡適致《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註，《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165-166，1959 年 3 月 5 日；雷震，《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8 年），頁 66-74；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 40 冊，頁 43、56，1959 年 3 月 4、5、26 日。

<sup>108</sup> 〈胡適致雷震函〉，1959 年 7 月，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195。

「保護傘」作用。

〈容忍與自由〉看似勸社方同人讓步，但從胡適提及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在公領域上，容忍是必要不可缺者，更說給執政者聽。<sup>109</sup> 當然社方戴杜衡、殷海光對之有不同意見，殷海光更強調法治約束統治者比要求容忍更重要。不少研究者也指出胡適忽略當面臨現實壓迫，又無從限制統治者權力以解決壓迫的現實困境。<sup>110</sup> 但如果法治已淪為統治者所掌控壓迫異己工具之一，又將如何解決？不管是胡適、殷海光可能都無法提出解決之道。更何況統治者實質上做出敵對並「法辦」《自由中國》的態勢與準備工作，至少從1958年4月起即展開。<sup>111</sup> 因此，然胡適希望人家「認真看待」的狀況效果，與放寬容忍的適用對象，在回到臺灣之後顯然不如預期。

因為胡適返臺，蔣胡關係衝突不斷。胡適針對蔣介石三連任問題之發言，更形激化蔣胡衝突。針對胡適是否要公開表態三連任，端木愷曾經建議即將赴美的胡適：「看看情勢再回來」。若蔣要三連任，可在美國發言公開譴責，甚至以包括辭去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行動抗議。此時胡適護照已經換為外交部顧問可使用的公務護照，<sup>112</sup> 若滯留海外，公務護照遭到取消，居留即成問題，加以「無錢在國外待半年」，<sup>113</sup> 的確使他無法像端木愷等人建議之以辭職、滯留海外等激烈手段進行抗議。此次胡適迎送機場面冷清，胡並特意表示紐約僑領不贊成三連任，引起《中央日報》發布假消息。<sup>114</sup>

<sup>109</sup> 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頁7-8。胡適在同年底演講，再度重申容忍之必要。林毓生即指出，胡適藉談論現實問題，提出他一貫性與連續性主張，即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林毓生，〈對胡適、毛子水、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上〉，《中國論壇》，第256期（1986年5月25日），頁54。

<sup>110</sup> 林毓生，〈對胡適、毛子水、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頁52；章清，〈中國自由主義：從理想到現實胡適與殷海光簡論〉，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07。

<sup>111</sup> 詳見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頁252。

<sup>112</sup> 周谷指出，此舉或是外交部依慣例，駐外大使卸任回國無實職時，均可獲聘為外交部顧問。周谷，《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頁236。

<sup>113</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114、118，1959年6月20、27日。

<sup>114</sup>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0冊，頁122、176-177，1959年7月3日、10月14、16日。

面對當局冷處理，胡適決定主動出擊。胡適於 1959 年 10 月 22 日（自美訪問三月返國後一星期），即與陳誠見面。10 月 25 日，胡適面見黃少谷，表達希望蔣勿毀憲連任主張，應明告外間國民黨的主張等四點意見，釋放風向球。11 月 4 日，胡適在教廷新公使酒會，碰到張羣即提出見面之請。張羣遲疑十天後，請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回應，由張和胡見面轉達意見。<sup>115</sup> 張羣之所以遲疑，顯示他瞭解胡、蔣雙方對連任問題之不同意見，以及蔣對胡之惡感，不欲發生新衝突。因為蔣已從陳誠處獲知胡反連任，盛怒之虞寫下：「其以何資格言此，若無我黨與政府在臺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sup>116</sup> 胡在情在理，均察覺蔣之習性及直接衝突之可能，仍不退縮。胡適特別在日記中寫下反連任是「盡公民責任」，顯然胡適不管蔣是否厭惡，仍要作理所應為之事，也再度測試蔣介石的容忍底線。研究者提醒過，胡適之溫文（不怨恨罵自己的人），奠基在自信與安全感的心理防衛早在 1930 年即建立。<sup>117</sup> 胡適若依舊以此看待蔣介石，即非特例。

11 月 15 日，胡適與張羣見面，重複蔣應公開宣布不連任意見。胡適針對張羣表達，蔣認為革命事業尚未完成、要對軍隊與反共負責之言表示，蔣不作名義上的領袖時，也曾享有領袖實際威望，不連任有助其抬高領袖威望。胡言意謂，蔣照樣可以當實際上的反共領袖，不必拘泥名位。11 月 20 日，張羣作了報告，蔣表示答案：無暇討論國大修憲與選舉總統問題，正全心全力策劃反攻問題。值得觀察的是，蔣又貶斥胡為「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其甚。」<sup>118</sup> 蔣介石顯然對胡適言行更感厭惡，以「莫名其妙」合理化蔣不予理會之作為。甚至在 11 月底，蔣面對陳誠與胡適互動，更猜疑胡想藉此操縱實際政治，並非真心支持陳，故為「國脈延續」，「不能不下決心，而更不能辭也」。<sup>119</sup> 蔣介石再度視胡適為美

<sup>115</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593-594，1959 年 11 月 14、15 日。陳誠可能是從黃少谷處獲知胡適態度，故明告蔣介石。

<sup>116</sup> 《蔣中正日記》，1959 年 11 月 7 日。

<sup>117</sup> 語意出自〈胡適致楊銓函〉，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冊，頁 508，1930 年 4 月 30 日。此一啟發來自胡明描繪面對廣東反胡人士的反應。胡明，《胡適傳論》，頁 826-827。

<sup>118</sup> 《蔣中正日記》，1959 年 11 月 20 日。

<sup>119</sup> 《蔣中正日記》，1959 年 11 月 28 日，上星期反省錄。

國等外在勢力意圖在臺操控的棋子之一，敵意濃厚。蔣更以「護國」、反攻大陸為詞，合理化違憲連任之理由。胡適期盼蔣介石不要戀棧總統名位的期盼，並未為後者所理解及接受，反而被貼上外國勢力代言人<sup>120</sup>的標籤，不再是蔣介石之誼友。微妙的是，正因為外有不可忽視之「外國勢力」，內有學界領導人地位，在公開場合，蔣介石對胡適言論，不得不忍。

胡適之後期盼蔣介石能藉 12 月底光復大陸設計研究會公開宣示不連任，但蔣未如此作，使胡也在日記宣洩情緒：又錯過「好機會」了！<sup>121</sup> 胡適已不管蔣對他的觀感與態度，堅持作「誼友」到底。此番思緒之下，12 月 29 日，胡適和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見面，藉題發揮，以領袖應培養能幹而忠心國家的人為接班人，適當時推他出來，並予全力支持。胡以此嘉許華盛頓創造美國成例，指責羅斯福破壞成例。<sup>122</sup> 胡適對羅斯福破壞美國成例不以為然，隱含蔣介石連任等同羅斯福破壞成例，沒有培養接班人、沒有建立制度。蔣若不連任，接班人自以陳誠居先。胡適此言既表明他不支持破壞憲政的蔣，也表明對蔣介石現階段可能接班人—陳誠之支持。蔣介石要當華盛頓抑或羅斯福，全在一念之間。但不管胡適怎麼說，蔣繼續「置之不理」策略，既在日記中發洩其情緒，同時思索應對方針。

1960 年 1 月 15 日，蔣介石在總統府見胡適，見面氣氛分外平和，令蔣訝異。<sup>123</sup> 這應當可解讀為胡適在勸諫責任已了後，不忘釋放善意，畢竟蔣已

<sup>120</sup> 胡適在留學美國時，認為「吾人無論國內國外只應奉行一個是非標準，否則無法爭論此事」。1914 年 5 月 15 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1 冊，頁 276。邵建指出，胡適不反對愛國，反對的是對內將國家凌駕於個人之上，對外將本國凌駕他國之上（以民族主義為外衣）的國家主義。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84-85。胡適熱中將在美國所體認的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介紹並實行於中國，如援引華盛頓、羅斯福、艾森豪等例，自有其思想與行動意義，此舉即令民族意識強烈，視自己為東方弱小民族代言人之蔣介石大感不快。中國於 1950 年代掀起批判胡適運動時，胡適此番思想即以「世界主義」是謂反動遭到批判。代表例證如汪子嵩、王慶淑、張恩慈、陶陽、甘霖，〈批判胡適的反動政治思想〉，《人民日報》，1954 年 12 月 17 日，版 3。

<sup>121</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646，1959 年 12 月 23 日。

<sup>122</sup>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 37。

<sup>123</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1 月 15 日。

掌握臺灣黨政軍大權，年紀已長、健康情況不佳的胡適背後並無任何抗爭資源。衡時度勢，一樣堅持反共，在公事上有從屬關係的胡適確實也無他計可施。若長期站在與執政者為敵的立場，年紀已長、健康情況不佳的胡適能否承擔？考量身心健康，與蔣有一定情誼，胡適也面臨人情壓力。但面對外間以為胡適太過消極，不可緘默之意見，<sup>124</sup> 胡適內心自是掙扎。

1960 年 2 月初，一場陳誠、梅貽琦、蔣夢麟等人在場的飯局中，胡適仍不忘表達反修憲意見，眾人談及時局，大多同意「如將人數問題作一種解釋使能作修憲或臨時條款之舉，則此門一開，將有危險甚多，不可不熟慮也」。陳誠於此靜默不言。2 月中，國民大會辦理代表報到，胡適表示，大法官對總額解釋放寬實有所不妥，擬在《時與潮》發文表態。在場的國史館館長羅家倫以出版者為人「有問題」，以為不可，胡適「大加駁斥，議論頗久」。梅貽琦最後打圓場「胡之態度既已明了，今日似無再申說之必要，因有時不說話之力量反較說話為大也」。王世杰也勸胡以大局為重「勿再發言」。<sup>125</sup> 中研院長胡適如在 CC 派立委、與雷震接近之齊世英主辦《時與潮》發言，政治意義大為不同，羅家倫反對理由，可以理解。胡適豈不知此中複雜？和羅家倫議論頗久更非尋常。旁觀者梅貽琦、王世杰理解贊同胡適立場，也有個人堅持，但身在公門，究竟不便，最多用「不說話」宣示個人態度。梅貽琦同時勸解與提點胡適，勿過度介入。胡適經過梅貽琦提點、王世杰規勸，在國民大會召開時，未採雷震建議之退席抗議，也擔任主席團主席，僅以拒絕擔任敏感議程主席表態。<sup>126</sup> 3 月 10 日，胡適因心臟病身體不適，入院作心臟

<sup>124</sup> 〈雷震致胡適函〉，1960 年 2 月 10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221-222。

<sup>125</sup>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頁 223、225，1960 年 2 月 5、13 日。《胡適日記》中，亦有毛子水致函，也支持不在《時與潮》發言。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691，1960 年 2 月 14 日。王氏意向，見 1960 年 2 月 13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 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頁 359。按羅家倫已非首次以「人格」質疑異見者，此次質疑 CC 派的齊世英，1952 年也質疑雷震。見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 47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216。

<sup>126</sup> 退席說，見〈雷震致胡適函〉，1960 年 2 月 10 日，萬麗鵬編註，潘光哲校閱，《萬山不許一溪奔》，頁 221。按胡適初不欲任主席團主席，王世杰表示「可考慮，作法可研究」。1960 年 1 月 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王世杰日記》



檢查，外間預期 21 日胡適不會投票，但 21 日胡適仍向醫院請假出席投票。梅貽琦也投票，事後梅、胡依禮簽名致賀。<sup>127</sup> 胡適此舉即如友好雷震亦不免認為「有點投機取巧」。<sup>128</sup> 但胡適若與蔣全面決裂，確實於事無補。胡適友人毛子水、王世杰勸說胡適，避免公開決裂，<sup>129</sup> 多少打動胡適；退而求其次，維持個人不擁蔣的立場，是現實局勢下最合理選擇。在蔣介石將就職前正研擬文告，胡適可能私下委託行政院祕書長及多年老友陳雪屏向蔣表示培植接班人意見，又令蔣光火，直斥「賣空生意，可恥之至」。蔣更把無法對胡適當面發洩之怒氣，發在阻擋陳氏留任祕書長，但未成功。<sup>130</sup> 蔣於總統就職文告中，仍堅持其身為領袖領導反共之重責，不容懈怠，<sup>131</sup> 又給胡適一記下馬威，強自欲占上風之表態。

胡適、蔣介石二人雖然都堅持反共，對自由內涵與堅守憲法定義不同，衝突不斷。諷刺的是，《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及社中傅正等人於 1960 年 9 月 4 日遭拘捕，隨後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遭到起訴，胡適在海外發表言論為雷震表白，自又形成蔣胡二人互動衝突及破裂。

9 月 2 日，蔣就認知「所謂反對黨之活動與進行，乃以美國與胡適為其招搖號召之標幟」。因此，逮捕雷震後胡適在美發言為雷人格擔保在其預期內。但蔣外示「寬容」，仍怨言滿腹：「此種真正的『胡說』本不足道，但有此胡說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政治為民主矣，故仍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余昔認為可友者，今後對察人擇交更不知其將如何

---

（手稿本），第 6 冊，頁 346。

<sup>127</sup> 投票行為與投票意向不能劃上等號。胡曾對雷表示，將投反對票。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9 冊，頁 3220；楊儒賓、陳華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頁 237，1960 年 3 月 21 日；雷震，《雷震回憶錄》，頁 76。是故，有論者以胡適投下贊成票，已過度推演。見陳漱瑜、宋娜，《胡適與蔣介石》，頁 158。

<sup>128</sup> 雷震，《雷震回憶錄》，頁 77。

<sup>129</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 6 冊，頁 360，1960 年 2 月 13 日。

<sup>130</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5 月 13 日。先前 1959 年中召開國民黨八屆三中全會，蔣便捨抽籤，取胡健中、黃朝琴為中常委，不選陳雪屏，以示警告。此次是對陳雪屏之二度警告。

<sup>131</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9 月 2 日。

審慎矣」。<sup>132</sup> 他還是拿自己見解邏輯衡量胡適，以胡不夠重視國家生存而予以譴責。蔣介石甚至認為素來友好的《時代雜誌》會在社論有所批評，都是胡適在美發言影響所致。這是預期內的外國勢力合擊。蔣的應對方式就是展現民族主義者的尊嚴：力挺不屈，因為國外輿論就跟政府一樣是以強權勢力欺凌中國此般弱者；和強權同聲一氣的自由主義者，在其眼裡就成為「本國所謂自由分子如胡適者，實昧良之洋奴而已」。<sup>133</sup> 因此，堅持將雷震定罪，就是蔣介石認為解決問題唯一以及最佳方式，也於日記提醒自己。<sup>134</sup> 如此，蔣對胡適即透露濃厚敵意，以堅持辦雷震回擊胡適。

人在美國的胡適為了營救雷震，確向高層進言，再度測試高層容忍底線。他獲悉訊息後，即兩度致電陳誠，並致函陳雪屏力主公平司法審判之必要。10月9日判決見報，胡適即避至普林斯頓度過雙十節，覺得「抬不起頭來見人」。<sup>135</sup> 回國後不久，11月15日才對祕書表示若有懂得司法者加入雷震軍法審判，雷有機會無罪釋放。16日險發作心臟病，稍事調息即赴夏濤聲餐宴，並在會上發言。<sup>136</sup> 上諸記載足以反應胡適對雷震案的極度掛念的沉重壓力。胡適顯然認為，在重視司法專業審查下，雷震將會無罪獲釋；隱指涉司法角色在此事件之淡薄及不專業，明瞭此事是政治介入司法的後果。因此，他仍忍不住在蔣介石詢問國際事務意見時，將話題引入雷震案。

但蔣介石早有準備，11月17日決定雷震覆判刑期之後，再召見胡適。在交談中，蔣介石重申雷震案是匪諜案，必須依法偵辦。胡適回應審判手續不足以服眾，不夠專業。胡蔣言詞交鋒，蔣毫不相讓：<sup>137</sup>

去年□□回來，我對他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

---

<sup>132</sup> 《蔣中正日記》，1960年9月8日。

<sup>133</sup> 《蔣中正日記》，1960年9月17日。蔣於之後日記（1960年10月13、18日）仍不忘發洩。這種責罵可視作蔣介石為加強自己對抗正當性所作之心理武裝，流露濃厚敵對意識。

<sup>134</sup> 《蔣中正日記》，1960年10月24日。蔣介石再度提醒自己：「胡說」聽之即可，「我行我事可也」。

<sup>135</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723-724，1960年11月18日。

<sup>136</sup> 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頁85-87。

<sup>137</sup> □□當指1959年3月間以聯合國大使身分返臺述職的蔣廷黻。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頁724。

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微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跟你說過沒有？

胡適立即回應，沒聽過，「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這樣的反應，一方面是蔣藉「套近乎」<sup>138</sup> 強調多年老友，不必仇視，一併指控雷震是破壞兩人多年交情的罪魁禍首。這對於期望解救雷震的胡適而言，自是嚴重指控，此語逼使胡適立即澄清立場：獨立自主不受人左右。在此種氣氛下，胡適必須對蔣重申道義上的支持，從 1949 年起至今毫無改變，以期盼領導人將寬容分給想組織新黨者作結語。<sup>139</sup> 蔣介石自信，在兩人談話中他所申述「只知國家不知其他」，與胡適多年情誼之談話「彼或有所感也」。<sup>140</sup> 但蔣介石的真心意在此：「胡適之胡說，凡其自誇與妄語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為匪諜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無話可說，既認其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辯論？」<sup>141</sup> 也就是，將雷震定罪是既成決定，無由更改，任胡適如何說，蔣就是不改變決定，決心予胡痛擊，對胡言論不得不容忍；同時以控制的法與國家機器為後盾，對雷震絕不寬容。

從蔣介石上述言論顯示，他若毫不在意，何需在日記中洩憤抒解？蔣也知道，在現實中不能真正對胡所言視而不見，不能不有所寬容，畢竟胡適所言「影響國際觀感」並非虛構想像。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指出：

這是家門以內的極權主義，它削弱了我們共同的反共目標而且損害美國在整個亞洲的聲望，它使我們喪失了對臺灣支援之正當的意識上的重要性。它對臺灣期盼在自由世界一個地區中擔任的角色，是一個挫折——在臺灣的中國領袖們也許可為在大陸奴役下的同胞們，樹立一個政治進步的楷模。

我們廣大的援助背後竟沒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嗎？我們冒了戰爭的危險保障臺灣，祇不過為了支持一個寧願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國家方法，而不願見健全的政治進步的獨裁政體嗎？令人似乎無法相信的是，我們二十年的盟友蔣總統。還會未認識清楚美國在臺灣的利

<sup>138</sup>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 年），頁 294。

<sup>139</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725，1960 年 11 月 18 日。

<sup>140</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11 月 18 日。

<sup>141</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11 月 19 日，上週反省錄。

益，部份是基於原則的，在華府的任何一位新總統將必須制定政策；而且，美國支持一個我們許多人所鼓吹的自由的中國，並不是自動的，但卻必須要靠美國的輿論。<sup>142</sup>

費正清曾致函胡適，建議他在全國性刊物發表聲明，以減低國民黨政府的衝擊，並為之挽回名聲。<sup>143</sup> 胡適將之交給張羣抄錄存查，既反應美國輿論，也在表態：他不輕易為人左右、願保留餘地用意在內。但胡適的用心，並未獲得相應回饋。11 月 23 日，胡適從宋英處知道覆判結果，胡適只擠得出「大失望，大失望」！次日看了新聞報導知道覆判日期，更「忍不住要嘆氣了」。<sup>144</sup> 蔣視定罪雷震為個人「不愧不怍」之表現，<sup>145</sup> 掩飾不住滿意之情。對照可知，人在臺灣的胡適或許至此方知人家並未「認真看待」回國以後的他，萌生無力與悲哀感。或許在 1960 年 12 月 11 日，胡適致張佛泉信函無意間流露無力與悲哀感：

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無數管制不力的努力打銷了，毀滅了。一個老朋友本月 14 日八十歲生日，我寫了顧亭林五十初度詩兩句給他：遠略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sup>146</sup>

在失望之餘，唯有寄望自我維持心志堅持到底，或許寄望來者承繼並超越，才是此時胡適的心聲。營救雷震不成，胡適心懷愧疚，將楊萬里詩作抄錄給雷震以示安慰，何嘗不寄寓抒懷與自勉之意？雖則胡適對蔣介石再度保證「道義」的支持，共通點卻僅存表面的「反共」。1962 年 2 月 24 日，胡適心臟病突發逝世。胡適與蔣介石的互動，此後也就是在祝壽、致謝等往來酬酢間進行，不再詳談，也不再是諍友。

---

<sup>142</sup> 雷震，《雷震回憶錄》，頁 44-45。

<sup>143</sup> 〈費正清致胡適函〉，1960 年 11 月 10 日，收入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731。

<sup>144</sup>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 8 冊，頁 732-733，1960 年 11 月 23、24 日。

<sup>145</sup> 《蔣中正日記》，1960 年 11 月 26 日，上週反省錄。

<sup>146</sup> 〈胡適致張佛泉函〉，1960 年 12 月 11 日，收入胡頌平編，《胡適年譜長編》，第 9 冊，頁 3398。

## 陸、結論

透過蔣介石、胡適兩位當事人，及同時代其他人的書信日記等史料顯示，蔣介石、胡適均明瞭彼此歧異，但彼此互動有合有離，由最初開始的緊張到一度的和平共處、彼此相助，最後又僅只表面和諧，而實質對立。大體言之，國難當頭之際，雙方自可捐棄成見，相忍為國家存續努力。胡適始終將自己定位為領導人之「諍友」，直言進諫，不管領導人愛聽或不愛聽，甚至是對他厭惡與否，或許是出自於一種知識分子的自傲與社會責任感。他願意中華民國政府及其領導人風雨飄搖之際予以道義與實際支持，這點不可不說可愛。胡適之「爭」，以堅持憲政、自由人權為基本，步步測試蔣介石之寬容底線，但也面臨來自領導人之人情壓力，令他行事綁手綁腳，無法如外間期盼採取更激烈的用行動抗議。胡適作為欠缺實力的知識分子，期望施展個人影響力，一旦此法面臨運用極限，不取激烈的政治抗議手段（甚至鼓吹革命），避免與領導人全面關係破裂，卻仍無法改變或抑制領導人選擇以掌握絕對權力作為維護反共大陸合法性依據，不惜破壞憲政制度之後果。此由胡適在雷震案爆發後，確實嘗試營救，也表達其善意立場，仍然無法改變雷震遭以「知匪不報」判刑十年的結果。胡適一生終究是以「自由評論者」終結，也是一種堅持信念之表現。

至於蔣介石之所以寬容與忍耐，自與胡適背後所代表的美國背景、學術界最高領導人有關，這使他必須拉攏，其一旦覺得在必要時機，需堅決採取行動回擊，以示其地位之尊、不示弱，絕不讓出尺寸之地。雙方之爭，實是情勢使然，並非單方退讓或釋出善意即可化解。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張性，由此可見；由此觀察胡蔣二人隨之相生之互動關係，也將有更清晰之理解。若能夠考量胡適個人身心健康與處境，加上相關時局，對他及其所受局限，自會更予客觀對待。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及資料集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各方建議（二）〉，特交檔案—分類資料—政治。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四）〉，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二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三年〉，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籌筆—戡亂時期（二十七）〉，籌筆—戡亂時期。

〈蔣經國家書（四）〉，家書。

〈革命文獻—蔣總統引退與後方布置〉，革命文獻—戡亂時期。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文件（四）〉，文件—忠勤檔案。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 210 次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紀錄〉，1956 年 12 月 20 日，黨史館藏，油印本，檔號：會 7.4/210。

〈張其昀、張炎元呈為對李大明談話等最近動態簽擬處理意見乞核示〉，1953 年 3 月 10 日，《總裁批簽》，黨史館藏。

〈第 43 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議紀錄〉，1956 年 12 月 26 日，黨史館藏，油印本，檔號：會 7.6/55。

《蔣中正日記》，原件藏於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王世杰日記，近代史數位資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Tsiang Ting-fu Diaries. Harvard University, Microfiche.

### 二、出版史料、日記、回憶錄等

〈中國自由黨組織綱要草案〉，《自由中國》第 2 卷第 1-2 期，1950 年 1 月 1 日及 16 日，頁 34、6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第 6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1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 王壽南編，《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第 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 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 周 谷，《胡適葉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校定版。
-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胡 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第 20 卷第 6 期（1959 年 3 月 16 日）。
- 胡 適，《淮南王書》。上海：新月書店，1931 年。
- 夏侯敘五編注，〈胡適與高宗武往來書信〉，《江淮文史》，2009 年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66-97。
- 秦孝儀總編纂，《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 5（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 年。
-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 張忠絨，《迷惘集》。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68 年。
- 曹伯言，《胡適日記全編》，第 6-8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
-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 年。
- 梅祖彥，〈寫在本書出版前的幾句話〉，黃延復、王小寧整理，《梅貽琦日記：1941-1946》。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1991 年。
-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一）：1956-1957》。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楊儒賓、陳華主編，《梅貽琦日記（二）：1958-1960》。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年。
- 雷 震，《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8 年。
- 萬麗鵑編註，潘光哲校註，《萬山不許一溪奔：胡適雷震來往書信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趙新那、黃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潘光哲編，《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年。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

### 三、報刊雜誌

《人民日報》，北京，1949 年、1954 年。

《中央日報》，臺北，1958 年。

《申報》，上海，1931 年。

《益世報》，天津，1948 年。

《聯合報》，臺北，1958 年。

### 四、研究論著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

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美國對華財經援助〉，《史學月刊》，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

呂芳上，〈總裁的「首腦外交」：1949 年蔣中正出訪菲韓〉，《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臺北：世界大同出版社，2011 年。

李傳璽，〈胡適第一次見蔣介石究竟在何時？〉，《中國經濟時報》，2008 年 7 月 23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23/content\\_8751505.html](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23/content_8751505.html)（2011/2/17 點閱。）。

李寶明，〈「國家化」名義下的「私屬化」：蔣介石對國民革命軍的控制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

汪士淳整理，《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汪榮祖，《學林漫步》。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林淇瀟，〈從「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試論《自由中國》與國民黨機器的合與分〉，收入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

林毓生，〈對胡適、毛子水、殷海光論「容忍與自由」的省察——兼論思想史中「理念型的分析」上〉，《中國論壇》，第 256 期（1986 年 5 月 25 日）。



- 邵建，《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金以林，〈蔣介石的1932年〉，收入王奇生等，《蔣介石的親情、友情與愛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胡明，〈讀《淮南王書》〉，《讀書》，1993年第3期（1993年3月），頁11-17。
- 胡明，《胡適傳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唐德剛，《胡適雜憶》。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陶英惠，《中研院六院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9年。
- 張忠棟，〈出使美國的再評價〉，收入《胡適五論》。臺北：允晨出版社，1987年。
-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卷一。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年。
- 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1950-1970）〉，《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46期（2010年6月）。
- 陳儀深，〈一九五〇年代的胡適與蔣介石〉，《思與言》，第47卷第2期（2009年6月）。
- 陳漱渝、宋娜，《蔣介石與胡適》。武漢：武漢人民出版社，2011年。
- 章清，〈中國自由主義：從理想到現實胡適與殷海光簡論〉，收錄於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
- 楊天石，〈蔣介石提議胡適參選總統前後〉，《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
- 楊金榮，〈重新認識一個完整的胡適——胡適晚年研究管見〉，《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1998年2月）。
- 楊金榮，《角色與命運——胡適晚年的自由主義困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 五、期刊論文

- 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第20卷第6期（1959年3月16日）。
- 胡適講，楊欣泉記，〈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自由中國》，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1日）。
- 敬禮，〈何以沒有讀《自由中國》的自由？〉，《自由中國》，第15卷第10期（1956年11月16日）。

